

舞鶴——舞動孤絕文學

以《餘生》得到二〇〇〇年台北文學獎的舞鶴。二〇〇〇年對於他更是備受肯定的一年，以《餘生》一書一舉拿下「中國時報開卷十大本土好書獎」、「聯合報讀書人十大好書獎」、「明日報十大本土好書獎」、「台北文學獎創作獎」、「金石堂年度最具影響力好書」五項大獎；在獲獎項肯定的同時，其實在文學創作者間對於舞鶴作品也有一定程度的讚賞，也有不少名家為之評論。在在都可看出今日台灣文壇因為舞鶴產生「舞鶴效應」。



(陳文發攝影)

舞鶴，出生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三日，本名陳國城，台灣台南人，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系，曾經出版過的作品有：《拾骨》、《詩小說》、《思索阿邦·卡露斯》、《十七歲之海》、《餘生》、《鬼兒與阿妖》。曾經獲獎無數，以〈逃兵二哥〉得到一九九二年度吳濁流文學獎，得過賴和文學獎，以《思索阿邦·卡露斯》得到九七年度的時報推薦獎。

若從《十七歲之海》和《鬼兒與阿妖》去認識接觸舞鶴，會被他書中赤裸裸的文字慾望驚嚇，肉欲世界沈淪，久久不能回神，且舞鶴嘗試的筆法和題材都稱的上邊緣的驚世駭俗，色彩強烈。不過從《餘生》這本書呈現出的舞鶴另一種風貌，加注了更多的人文關懷和本土意識的呈現。從霧社事件開始談起，作者來到了山林做田野調查，以自稱追尋者身份的舞鶴去訪問各種不同身分經歷霧社事件的人，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去詮釋霧社事件，不管是自稱莫那魯道後裔的姑娘，或者是那些已經被訪問了無數次的各部落後代，他們在一回又一回反芻著當年的事件時，等於也重新地咀嚼過他們因為特殊的身分而已經被建構又解構太多遍的歷史事件。文明與原始，所謂對於原住民生活或生命的省察，其實在看似羅生門的追尋過程中，蘊含了頗多對於生命的深意，值的細細咀嚼，各人經營著各人餘下的生命，肉身有天會走向死亡，但發生過且被貼上眾多標籤的政治事件卻在一代代人的腦海裡口耳相傳或是記錄，不斷滋長、變形，每一層意義被剝落都是為了賦予歷史新的或不同的意義。

現在的人對於霧社的印象在於美麗的櫻花和溫泉居多，但很少人會緬懷在七十年前發生的霧社事件，原住民的大規模起事對抗日本殖民者。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泰雅族馬賀坡社的首領莫那·魯道聯合其他六社戰士，約三百人左右，偷襲出草日人一百多人，日軍大怒出動軍警近七千人，用盡文明武器槍砲甚至毒氣瓦斯。事件一直持續到十一月十一日，莫那·魯道兵敗自殺於密林中，隨之慷慨赴義者不在少數。起義六社原有人口一千六百三十二名，經過霧社事件後，自殺和戰死者高達六百多名，死傷慘烈。日方也損傷慘重，史稱「霧社事件」。《餘生》一書就提到原住民戰士出草功績卓越大跳儀式之舞，全族男女媾和的場面，也提到之後的日軍反擊追殺，原住民逃亡，多少婦女(例：馬紅)為了保全族中戰士將小孩丟置懸崖或是水流裡活活慘死的人倫悲劇。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後來又有第二次霧社事件，次年四月二十五日，投降並被日人收留的五百六十四名「保護番」遭敵對番社出草突襲，餘生者剩下二百九十八名，均被移至川中島，即今天的仁愛鄉清流村，也就是作者追尋溯源的地點。霧社事件是日本殖民台灣史上最劇烈的反抗事件，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隨著時間一久，逐漸被後人淡忘，儘管事後官方在原址設置紀念碑和莫那·魯道的雕像，年年按時舉辦紀念儀式，卻鮮少有人知道事件背後的起源與含意，如今被大眾知曉的恐怕只有廬山溫泉和美麗的櫻花季。

舞鶴在小說後記提到，這本小說寫三事：其一、莫那魯道發動霧社事件的正當

性與適切性如何。兼談第二次霧社事件。其二、我租住部落的鄰居姑娘的追尋之旅。其三、我在部落訪見的餘生。除了造訪了官方的抗日紀念碑，真正觸動舞鶴心靈的是「餘生碑」，由部落族人沈默的設立，低調到近乎卑微，但越卑微卻越能扣人心弦，在這座餘生碑間，舞鶴開始他對歷史的收集和見證。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泰雅族的姑娘，莫那魯道的孫女帶領作者拜訪部落各色人種，這是一趟追尋之旅，所有當年經歷過霧社事件的人多多少少有過劫後創傷，像是馬紅縱使經歷不死但最終歸宿還是死亡，因為承受不了生之痛。舞鶴也許將霧社事件這整個探討與回歸當作一種治療文學的書寫，除了正視到快要消失的歷史事件，寫作的過程中也不忘穿插進現在原住民生活的處境，過去和現在交錯形成一種奇異的書寫，對於過去戰爭對霧社居民的傷害對比現在文明對於原始山林的侵略同化，都是一種創傷對於人心都有無形有形的影響。作者深入對傷害的剖析可能是種種什麼什麼的原因，面面俱到，什麼樣的詮釋觀點都多方考量，試圖找出有可能的原因，能不能對症下藥不知道，起碼揭露出一種過去和現代的困境弊病，除了舞鶴寫作過程的深層反省外，也為讀者帶來了一趟深入的追尋台灣本土內地文化之旅，相對於城市的另一種弱勢族群，喚醒對於他們的關懷。

最後，舞鶴與姑娘的「馬赫坡追尋之旅」是這整個歷史回溯事件的高潮也是結局，藉著慢慢深入深山溪谷的野外之旅，想像著前人也曾走過一樣的道路，作者的餘生活生生的在面前開展，他有生命的自

由和美好，而歷史的餘生呢？只存在作者的想像中快湮滅於荒山野嶺，一個作家摸索著這一片快要被人遺忘的土地的自白：「我並非偶然到川中島來。但純因為餘生兩個字讓我居留下來，我想真實體會劫後餘生而事件只是必須觸及的因緣」從歷史的餘生發展到舞鶴自身的餘生，覺得生命的自由，也思考了所謂尊嚴的問題，霧社事件的發生在於一個「作為一個泰雅人反抗的尊嚴」，但最後也因為現實的考量，「霧社事件」後，泰雅同胞卻泯滅了尊嚴。以一個文明人和泰雅族人來說，尊嚴這樣平等的東西，受限現實的因素，平地人通常得以保存他們的尊嚴，而山地人卻不行，被欺壓欺負或瞧不起。姑娘的平地境遇淪落風塵又回到山裡就是一例。我們看餘生這本書真的可以思考到好多的問題，關於台灣土地上還有這樣一群弱勢的民族，或記憶歷史的痕跡。

楊照以「孤絕文學」概括舞鶴的作品，認為他的思路一直都未離開現代一鄉土這樣的主軸，是一種真正的「本土現代主義」。而葉石濤認為舞鶴是天生的台灣作家，熟悉台灣歷史的變遷，各種社會背景，也正確掌握了台灣歷代民眾生活的動脈。王德威認為舞鶴是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他總能幽幽的探索一種台灣人與社會的曖昧處境。以上這些名家論舞鶴，都將之作品歸之為「孤絕」，也就是舞鶴的文字特色，以瞭解台灣為寫作職志，背負沈重的關懷意識，從歷史或鄉土反省到自身生命，開展出二〇〇〇年文學的主要特色之一。（楊澄靜）